

白首回眸

回忆当年“一二·一”

1945年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是我人生征途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当时是日本投降，二战胜利，全国人民企盼和平与民主，可蒋介石仍然坚持法西斯专政，一心想扑灭共产党、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内战危机迫在眉睫。昆明学生率先发动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1945年12月1日，惨遭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四名师生，英勇殉难。事件发生后，全国震动。各大城市纷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声援昆明同学及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

那时我在成都甫澄中学念高二。早在1943年，我就参加了大中学生的进步组织燧火社。1944年—1945年，由于地下党员的参加和领导，她实际上已成为党的外围组织。

“一二·一”的消息传到成都，燧火社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全体社员积极投入斗争。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秘密散发了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的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在民盟盟员、燧火社社长、我们的老师崔宗复先生带领下，我和其他几个燧火社骨干份子拜访了张澜先生并聆听了他对当前时局的分析，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12月7日晚，燧火社社员通宵夜战，写标语、印传单和《告全市同学

书》。次日清晨，分头出动，在全市各主要街道和学校门口张贴，然后回到各自所在的学校去宣传、发动和组织同学参加这一运动。

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可是我没有一点倦意，热血始终在我胸中翻腾，正义感和强烈的爱憎之火在我心中燃烧，使我没有任何畏惧。我回甫中后，立即找我们的星火文艺社社长廖光策商量，很快召开了紧急社员会议。

我是星火文艺社编辑，主编《星火》壁报。时间紧迫，来不及等大家写文章，于是我利用手中的《华西晚报》，搞剪报，附加醒目的标题和我们的呼吁，很快编出了《反对内战暨援助昆明受难同学特刊》。《华西晚报》是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实际上是地下党领导的。文革后我看过一篇文章，是该报党的负责人田一平写他到重庆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回忆，才知道《华西晚报》是南方局领导下的报纸。我虽然不认识该报的编辑和负责人，却在该报发表过大量的杂文。在她的庆祝创办几（？）周年的特刊上，还发表过一首题为《我歌颂你——大众的吹鼓手》的诗。

甫澄中学同别的蒋管区的学校一样，实行的是法西斯教育，所以我们的《特刊》和标语传单只能在晚间贴出。第二天是一二·九运动纪念日，是全市大中学生示威游行、声援昆明同学的日子。一大早，星火文艺社会体社员二十多人，在我和廖光策的带领下，溜出校门，参加示威游行去了。

游行回来，喘息未定，军事教官就传讯我和廖光策。我们早知道，军事教官是国民党特务，是专门搞奴化教育和监视进步学生的勾当的。我们都抱着“不怕牺牲”的决心。走进训育处，看见满脸横肉的军事教官阴沉着脸，见我们来

了，他就暴跳如雷，眼里迸射出杀机，厉声问道：“是哪个把人带出去参加游行的？”“是我！”我们两人都抢着回答。“好呵，你们不怕死呀？”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你们懂不懂利害？看来，出什么特刊，到处张贴共产党的标语、传单，都是你们干的了！”我们以沉默来反抗。最后，他说：“你们回去写检讨，写交代，要交出是哪个唆使你们干的！”我们默默地走了。出了“训育处”的门，廖光策低声说：“鬼才给你写检讨。”我说：“当然，我们没有错。”

放寒假后的第二天，或许是第三天，我得到学校的通知：“下期勿庸来校。”这是“默退”，即不挂牌的开除。后来知道不仅我和廖光策被开除了，星火文艺社的全体社员都被开除了。

这个“默退”的通知，我不敢拿出来给父母亲看，也不想同他们商量我该怎么办。十六岁的我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了。“到处都是黑暗，到处都是法西斯教育，我到哪里去呢？”

正当我彷徨无主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曙光——燧火社的好朋友张天义来了。

张天义是金陵大学学生，燧火社骨干，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1948年，他在川北组织游击队，是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建国以后，改名张乐山，在川北和西南工作过一段时期，后来调到中央纺织工业部任建设局局长。

我把我的苦闷告诉了张天义。

张天义说：“不用愁，你有个最好的去处——重庆的育才学校。”接着，他向我介绍，这是蒋管区最好的学校，那里实行民主教育，那里有最好的老师，学的是革命的理论，

等等。

我焦急地问：“那我怎么去呢 要考试吗？”

他说：“我给你找人写一封介绍信 进校没有问题。”

他很快给我带来一封介绍信，是四川大学李相符教授写的。我知道李先生是民盟中央委员，却不知道他还是地下党员。

我高兴极了，在 1946年 2月，我就背着父母，偷偷地动身到重庆去了。

我顺利地考进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社会组。在那里，学习了马列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95.11.18夜为纪念“一二·一”五十周年而作

育才，我的保姆

想起育才，我的心就不禁怦然跳动，那些金子一样闪光的日子，仿佛又在我眼前熠熠发光。可惜我在育才的时间太短了。但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她哺育了我，使我较快地成长起来。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真正的起点。她使我懂得，人，究竟应该为什么而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有意义。它把辉煌的革命真理展示给我，从此以后，我就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

记得那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正在兴起的时候。那时我十六岁，在成都参加了一个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燧火社。凭着一点对党的朦胧的认识和从进步文艺中吸取的一点营养，我满腔热诚地投身于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在积极声援“一二·一”西南联大事件和反内战的斗争中，我被甫澄中学开除了。这时，我对成都一般中学里的法西斯教育十分反感，不愿意转到任何一个中学去又不敢把我被开除的事告诉家里人，因此，我彷徨无主了。正在这时，燧火社的领导人之一、地下

党员张天义跑来安慰我，对我说：

“你不要着急 你知不知道重庆有一个最好的学校？”

“哪个学校？”我惊喜地问。

“育才学校 陶行知先生办的 那是一个民主堡垒。”接着他就给我介绍了学校的一些情况，我当时感到非常新奇。听到那里没有法西斯教育，学的是革命理论，我就十分向往了，可是我又担心人家不要我。我急切地问：

“要考吗 考些什么？”

“考是要考一下的，但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可靠。这一点，我可以找人给你写封介绍信。”

很快他就把地下党员、民盟中委、四川大学教授李相符先生的介绍信拿来了。于是我就瞒着家庭，偷偷地跑到重庆。

1946年初春的山城，光明与黑暗、民主与独裁正作着殊死的搏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政治浓雾正笼罩着山城。我找到了在重庆的一个亲戚，一个长辈，他是一位开明人士，一听说我是考育才的，便明白了我的思想倾向，立刻就介绍了一位他的自来水公司的同事高力生给我。高力生，社会学系学生，三十多岁，脸黑黑的，嘴边有浓黑的经过修整的胡须，很精干的样子。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好！小朋友，社大和育才是姊妹学校，你来考育才，太好了！”

他带我在山城的马路上逛了一周，一路告诉我重庆的近闻：新近发生的较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先生被特务打伤了；反动派组织了反苏游行，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捣毁了……我们漫步在民生路上，我看着新华日报营业部三层楼都打得破烂不堪了，心里不禁燃起了怒火……

高力生还带我到管家巷 28 号育才学校城内办事处，那时候陶先生不在，马侣贤副校长接见了我们。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同意我参加入学考试。我本来准备考文学组，但马校长告诉我文学组不招生，只有社会组才招生。高力生又竭力怂恿我考社会组，告诉我学好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于是，我报名投考社会组了。

（写到这里，我要向高力生烈士的英灵敬致悼念之忱，解放前夕他被敌人杀害了）

在考试之前，高力生又告诉我，要考一点哲学。我很惶恐，因为我没有学过哲学，于是他又同我一道到三联书店去买了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连夜赶着读，可是并没有读懂，只背得辩证法的三大定律。果然考试就考了三大定律。我只能把它背上去，却不能解释清楚。好在我还有一点社会科学的常识，十八道试题，大概我能答上大半。按规定：除考试之外，还要写“自传”。交上自传，我满怀信心地等待考试结果。

笔试算是过去了，我考得还不坏。然后，由社会组主任苏永扬先生主持口试。使我怪谔的是，苏先生对我的情况非常清楚，我在自传里没有写到的燭火社与另一个团体合作出刊物的情况，他也问到了。

很快我就得到了录取通知。我就要到全中国（实际上是国民党统治区）最好的学校念书去了。我是多么幸福！我开始懂得，苏先生主持的口试，正是革命组织对我的审查。育才革命的学校，不能让一个坏人混进来。因此，我更热爱我们的育才学校了。

二

我在办事处报名之后，就参加了正在城里的“育才寒假见习团”。

有一件小事在我的脑中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我初到见习团的日子。有一天，社会组的廖意林老师和文学组的女同学陶月初正在一起谈话，我走拢去，廖老师问了我什么，我于是就滔滔不绝地叙述我入学的经过。我谈到陶校长不在，见到马校长，苏主任，怎么怎么，于是她俩就大笑起来，笑得前翻后仰，不可开交。我莫名其妙，脸一直红到脖子根，我想，我一定是说错了什么话了，可又不知道说错了什么。再三询问，才知道育才有一个规矩：年轻的教师都称呼大哥、大姐，年老的教师、校长都称呼先生，没有叫什么主任、校长的。我一面感到惭愧，觉得自己的“旧意识”太深了，一面也非常高兴：这里真是亲如一家啊！

在见习团的日子过得非常幸福！我们社会组和文学组的几十个同学住在上南区马路一幢高楼的楼上。没有床，到晚上，我们把各自的被盖卷打开在地板上睡觉；早上起床，就把它卷起来，靠墙壁一排放着。早上，我们在晒台上开朝会、唱歌。我们经常唱的是陶先生作词的《手脑并用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是个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唱着这支歌，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我感到精神焕发，信心十足。我想，陶先生的歌词，是多么生动、活泼的语言，而又包含着多么正确、丰富的思想呵！我更热爱陶先生

了，虽然这时我还没有看见陶先生——他正在为国家大事、也为我们学校操劳呢。

我们每天听讲演。老革命家、有名的学者、作家、教授轮流给我们讲。我知道他们来给我们讲演，是因为关怀我们学校，因为我们是“民主堡垒”，我们这些学生是革命的幼苗。我如饥似渴地贪婪地听着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尽可能把它笔记下来，铭刻在我的心上。记得有一次邓大姐来给我们讲话。我们全体同学都沸腾起来，邓大姐穿着朴素的粗呢子制服。她神采奕奕，兴致很高，和我们很随便地谈话。我还记得她讲到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时她正患肺病，很严重，要人抬着走，她心里很不安。她告诉我们，无论病多么重，环境多么艰险，她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终于战胜了病魔，她现在完全恢复健康了。听到这里，我们都笑了，为邓大姐的健康，我们十分高兴。邓大姐又同我们亲爱的意姐谈话，她是那么亲切，那么体贴入微，她也跟我们一样叫“意姐”——写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就是这一位我们的意姐，我们育才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这一位被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革命老前辈邓大姐称呼为意姐的同志，被“四人帮”迫害而死已经十一年了，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意姐的……

有一次翦伯赞先生来见习团讲演，讲完之后和我们随便聊天。有一位小同学天真地问：“翦先生是什么党？”翦先生戴着一副眼镜，神情严肃，看了一眼这位同学说：“我是反法西斯党。”我感到这句话说得非常有力，表现了翦先生同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的坚定立场。我当然知道中国并没有一个反法西斯党，翦先生即使是共产党员，当时也不能明

说。翦先生这句话和他说话的神情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以后我读翦先生的著作《历史哲学》和《中国史纲》，那时的情景还常在我的脑际显现；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在报纸上大批翦伯赞这个“反动权威”时，我除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嗤之以鼻之外，也想到翦先生这句话。我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坚强的反法西斯的革命战士，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会突然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

晚上，我们育才寒假见习团的同学又常常到我们的姊妹学校——社会大学去听课。有一次，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何其芳先生讲课，好像是听他讲他的《夜歌》，或者是讲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我忽然察觉到我背后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戴着眼镜，黑敦敦的，很结实的样子，也在专心听讲。我悄悄问旁边的同学，才知道这就是陶先生。我开始有些诧异，原来我想象中的陶行知先生是温文尔雅，有“学者”风度的，现在，站在我身旁的陶先生却没有那种“风度”。我在思索之后终于找到了答案：陶先生不是主张“手脑并用”吗？他怎么会是温文尔雅的样子呢？这正是陶先生之所以为陶先生！于是，我又一次发现了我的“旧意识”，我非常惭愧地感到，我的旧意识实在是太多了。

有时候，某个剧团有什么好节目演出，我们就集体去看戏。我们看戏是不花钱的。我心里想，这还是因为我们是“民主堡垒”的缘故，当时的重庆，虽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心，但文艺界却是进步势力占优势。所以，剧团常常免费欢迎我们看戏。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开小型的晚会。同学们坐在自己的被盖卷上靠着墙壁，表演的同学就在中间跳起秧歌舞来。全

体同学都加入齐唱，有时还拍着手唱。我们喜欢跳《朱大嫂送鸡蛋》，唱《茶馆小调》、《古怪歌》等等，这些歌、舞，后来就渐渐流传到各地大中学校去了。

夜晚，隔岸扬子江畔灯火闪烁，沿江的上南区马路若明若暗，马路上一幢高楼上歌声嘹亮，它好像一股奔腾的激流，要冲破这笼罩山城的黑暗……

三

寒假见习团结束了。我们回到学校、回到红岩村来了。“红岩村”，这是多么美、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当我踏上红岩村的土地时，我看到岩石的颜色的确是红色的，土地也是红色的。我们美丽的学校就在这里！在半山腰上！山上，还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即中共中央南方局），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就在上面办公。山下，有新华日报的印刷部和编辑部。这里，真是我们的“红色区域”呵！土地是红色的，我们的心也是红的，我真想扑在地上，亲吻这可爱的大地，我真想倒在地上，扑在大地的怀抱里……

可是，那时候，幼稚的我竟一点也没有想到，这美丽的地方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腹之患”，这山前山后，正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斗争呵！

我编入社会组二班，我们这学期的课程有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宪法概论、中共党史、青年问题等。每个星期，我们还要听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给我们作时事报告。

我们的同学都非常关心时事，平均二、三人就有一份新

华日报。报社的报童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每天早上一早就送报来，直接送到我们手里，还坐在我们的床上给我们讲述新闻。

我们的课外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经常组织晚会，有诗歌朗诵、诗剧、歌剧、舞蹈、音乐节目，丰富多彩。大型一点的晚会就在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礼堂上去开，同办事处的同志一起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我和文学组、舞蹈组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四八歌咏队”（由成立时是四十八人得名）。舞蹈组的小同学最多，他们亲热地叫我刘大哥，其实我也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他们是多么聪明、可爱呵！有时候，我在晚会上看见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真是感动极了。我不禁这样想：他们都是沦陷区的孩子，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要是没有陶先生，没有育才学校，他们现在即使还活着也不知道成了什么可怜样儿，哪能有今天这样的欢乐！他们的聪明和创造才能，早就被埋没了。后来，当我唱起端木蕻良作词的《新儿童赞歌》时，我总是要想起他们——

人类的孤儿呀在荒野里长大
人类的孤儿呀受尽了风吹雨打
被丢弃了的孩子们
吃了野狼的奶长大……

是的，他们就是“吃了野狼的奶长大”的。我想，我也是个孤儿，虽然我有父母，可是他们同我不是一条心，但是，我现在也吃了“野狼的奶”，就要“长大”了。

我还参加了文学组同学组织的四月诗社。由于我在成都的报刊上投过稿，发表过一些非常幼稚的习作，同学们就选我当学生自治会的总文化干事。我曾经为编辑一个油印的学

生自治会的会刊，着实忙了一阵子。但我不会依靠同学们、发动同学们大家来办会刊，只是一个人埋头搞，结果搞的质量很差。没有稿子，我甚至把过去在中学写的感情不大健康的诗也拿来勉强凑数。后来我看见社会组出的壁报，质量比我编的会刊好，感到很惭愧。正在这时，红岩小学的教师同志向我开火了。

红岩小学同我们毗邻，也是我们的姊妹校。其中的教师同志当然比我成熟得多，他们发现会刊的缺点，写文章对会刊进行了批评。我感到恼火，不虚心检查自己，反而写文章还击。于是一来一往，打起笔战来了。后来还是我们敬爱的苏大哥把我找了去，很耐心地给了我教育，促使我猛省，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才停止了笔战。

从那以后，我逐渐认识到，我的家庭出身给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同许多同学在思想上的差距是很大的，于是，我开始比较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且认真地向老师、向同学们学习了。

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呵。尽管当时我们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每个月三元钱的伙食费，常常是干豌豆作菜，但是全校师生同甘共苦，没有听到一点怨言。我们社会组的苏大哥、意姐都患着肺病，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有病，从来不要求有任何照顾。每当我看见苏大哥两颊深陷、颧骨突出，未老先衰的样子，特别是看见他上课之后气喘吁吁，心里就非常难受。苏大哥、意姐也同我们一样吃干豌豆下饭，吃三元钱一月的伙食，没有一点特殊，甚至年老的方与严先生，听说学校给他一点伙食补助，他都用来帮助困难的同学了。我们的同学大多数是难童，衣衫穿着都很破旧，但是个

个都是朝气蓬勃、精神焕发，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同学唉声叹气，更从来没有听说过吵架的声音。大家都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老师从来没有呵斥过任何一个同学，没有一个同学不衷心敬爱我们的老师。这里是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和校外的一片黑暗，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简直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理论、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使我的激情逐渐升华为理性的思考，我的前面出现了越来越清晰的光明前景，我的心逐渐踏实起来了，我和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

四月初，我们听说叶挺将军出狱了，大家都非常高兴，有些同学还去参加了欢迎会。可是，很快就传来了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一批无产阶级老革命家，飞机失事，在黑茶山遇难。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们还有一位同学，音乐组的黄晓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也同时殉难。大家心情沉重，说不出话来了……

郭沫若先生很快写了挽歌，由夏白老师谱曲。我们育才同学组成了挽歌队，坐上卡车，进城参加四八烈士追悼大会去了。

大会会场门口摆满了挽联、花圈，扎断了半条街。我们一进入会场，就感受到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主席台上点上了大蜡烛，并排放着十多位烈士的巨幅画像。我一眼瞥见主席台侧的一副挽联上面写着“李公朴敬挽”几个字，挽联上写的话已飞入我的眼帘：“你们的死，使我格外不怕死！”我想起刚到重庆不久，我就和几个同学一道去看望过被特务

打伤的李先生，那时他还用纱布裹着头，睡在床上。现在，我回过头看台上，他满脸大胡子，正巍然屹立在主席台上，显出凛不可犯的样子。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向他注目。——但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三个月之后，李公朴先生在昆明竟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追悼会是民盟主席张澜先生主祭，李公朴先生司仪，郭沫若先生读祭文。我听着郭老朗诵他自己撰写的祭文时声音在发颤，热泪正在他的心里奔流，听着听着，我感到他哽咽起来了，我自己也早被泪水模糊了眼睛……

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出席讲话了。他脸色严峻，屹立在主席台前。要是在平时，我一定会跳着欢呼起来，可是在这样的场合，我只能呆呆地望着他。我只是不断地呆呆地想：他是多么难过呵！一下子牺牲了这么多老同志，这么多党的好干部，这么多中华民族的精英！我一面揣度着他的心情，一面努力在他的脸上寻找悲伤，可是，没有——他的脸上只有严峻，没有悲伤！呵，我明白了！伟大的周恩来同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多么能够克制自己呀！在这样的场合，你不能过分悲伤！你是一座大山，你是擎天之柱，会场上成千双眼睛在看着你，全中国人民在看着你，敌人也在看着你呀（他们也在主席台上）！你不能有丝毫的软弱、丝毫的沮丧呀！

可是我听到了哭声，先是低低啜泣，后来渐渐扩大开来，哭声终于汇成了一片，我早已不能控制自己，只好低下头痛哭起来。一面哭，一面紧握拳头，我宣誓，我要继承烈士们的遗志，我一定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者，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